

主编 刘瑞琳

温故

之八



温故

吕翼仁

回忆我的童年

巫宁坤

一代才女赵萝蕤教授

陆蓓容

萧条异代使人愁

——沈祖棻与盛静霞

汤伏祥

莫理循眼中的袁世凯及其他

古远清

戒严体制下的台湾诗坛

星星

男男女女五十年

——关于「作风问题」的回忆

汪秀枝

学术自由在西南联大

陈仁德

祖父和父亲的日记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温故. 8 / 刘瑞琳主编.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5

ISBN 978-7-5633-6555-5

I. 温… II. 刘… III. 中国—现代史—史料 IV. K2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546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 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政编码: 271000)

开本: 635mm × 965mm 1/16

印张: 12 字数: 170 千字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特稿

吕翼仁 回忆我的童年 / 1

人物

巫宁坤 一代才女赵萝蕤教授 / 33

陈 远 傅泾波：站在司徒雷登身边的人 / 40

陆蓓容 萧条异代使人愁

——沈祖棻与盛静霞 / 47

袁津琥 天下何人更知君

——从《闻宥遗札》看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风貌 / 58

汤伏祥 莫理循眼中的袁世凯及其他 / 69

聚焦

古远清 戒严体制下的台湾诗坛 / 87

回眸

星 星 男男女女五十年

——关于“作风问题”的回忆 / 106

汪秀枝 学术自由在西南联大 / 116

臧翠莲 昔日校园琐记 / 122

孙立川 违难蒙山的文人们

——饶宗颐、简又文、梁羽生先生的难中轶事 / 130

记忆

陈亚先 伤逝之痛

——阿复与大姐 / 138

周成林 残 云

——外婆的故事 / 149

文本

陈仁德 祖父和父亲的日记 / 152

冯伯昕 抗战八年来生活之回顾与今后 / 162

回忆我的童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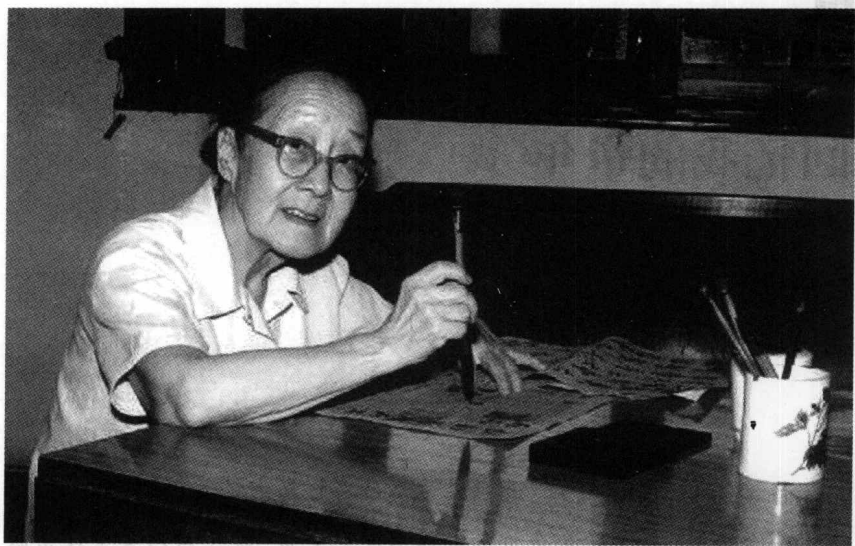
吕翼仁

吕翼仁(1914—1994)，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之女，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外文学会会员和翻译家学会会员。晚年为乃父整理出版遗著，备极艰辛，深受学术界赞许。《回忆我的童年》系作者未完成的遗稿。——编者

常州十子街

我家世居常州十子街。现在常州已经改为江苏省辖市了，市区面积有九十四平方公里。可是我生长在那里的年代，常州这个地名是沿袭着明清以来旧称，仅不过是指当时武进县的城区。虽是旧的府城，而并不算大，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只有三华里，这就是当时所谓“穿城三里”，城墙城门也都保存着，走上城墙，还可看到乱草丛生残留的雉堞。城门也还有实际的用处，记得江浙战争时，有时怕败兵抢掠，就临时闭城。后来城墙破坏，城砖陆续被人偷走，城墙也就逐渐废弃了。

从前常州手工业最发达的梳篦，远销南洋。我小时候最有名的梳篦铺子是王大昌，然而王大昌不止一家，有真正王大昌，有老王大昌，后来又有石库门王大昌。不过据长辈说，早前最有名的，还不是王大昌，而是西门外一家叫陆什么的。当时几家梳篦铺争吵，大家赌气把梳篦抛到河里，隔了一个时候打捞出来，只有那家叫陆什么的店铺的篦子，入



作者晚年在家中的书房里。

水不散，一时名气大响。这传说究竟有几分可靠性，我也说不上来，姑妄听之罢了。

常州食品中，出名的是小笼包子和大麻糕。小笼包子有虾仁的，有蟹粉的；大麻糕有甜有咸，还可定做。我小时候常州还是个小城市，甚至居民家里装电灯的还不多，请客酬应，一般都是吃早点。早点除包子麻糕外，还有各种花色面，也好点菜喝酒，但夜市远不如今天热闹。食品中有一种叫口香饼，现在已没有了。口香饼小如目前五分的辅币，两面松脆，中间是糖馅，吃时略有香味，价格十分便宜，我小时候常吃。后来卖口香饼的店铺少了，再后来只有一家经营了，最后，干脆买不到了。估计是手工制作麻烦，盈利又薄，所以这种食品就被淘汰了。工业品中也有一种被淘汰的，就是罗筛绢，前面两个字很可能写错，这是家庭工业品，门面很狭，只有一两种颜色，质地也不柔软，有类生丝，由于用度不广，后来也没有了。

十字街在常州城的东北部，是条又狭又短的横街，东通婆罗巷，西通化龙巷。街中心是石皮铺的，两旁砌着砖石。由于街面狭，日照少，

东西街梢又各有一口公井，家里没有井的居民，都到公井上淘米洗菜和拎水，不下雨的日子，街上也总是湿漉漉的，下雨之后，自然更没有干的时候。特别是下雪，雪被行人踩坚，成了冻雪，真是走一步滑一滑。甚至街中心的雪融化之后，两旁一堆堆污泥冻雪，还要维持好些日子。

十子街尽管有这些缺点，却也有其独特之处。在以“多福多寿多男子”为颂祷的年代，十子意味着多生贵子。所以在嫁娶吉日，我们那时叫做周堂，花轿哪怕绕道，也要经过十子街，花轿一肩接着一肩，整天锣鼓声不绝于耳。吉日前一天是铺新，我们叫做铺行架，箱笼也要经过十子街。这时候，街道两边家家户户门口都站着几个大娘大姐。铺新的日子看嫁妆，吉日良辰看新娘。实际上新娘坐在花轿里是看不到的，但是送亲的姑娘奶奶们坐的小轿，个个浓装艳抹，珠光宝气。后来送亲的人索性不坐轿，改坐人力车了，看的人自然格外便于观赏。

现在回想起来，使我惊异的，倒不是人们爱看花轿，而是人们何以百看不厌。十天里，少说也有两三天是吉日，而那种场面其实是差不多的，究竟是什么在吸引着人们呢？我们家乡有句俗语，“镗锣响，脚底痒”，就是形容这件事的。

我家既然住在十子街，自然多少要受到影响。街上镗锣一响，我家女佣立刻把我抱起来，往肩膀上一放，嘴里说：我家宝宝看花轿去，就飞快地往门外走。然而两三岁的“宝宝”，对绣花枕头、丝绸被面和花轿，有什么兴趣呢？一到门外就嚷着要回去，女佣始而装聋作哑不睬我，我就大嚷之外，再加乱踢，这一来女佣只好带我回去了。后来母亲轧出苗头，逢到这等时候，就对女佣说：“你们自己去看吧，别带孩子了，孩子小，懂什么呢？”

我尽管不爱看花轿，可大门外边也有很多吸引我的事务：春天早晨叫“马兰头枸杞头”的声音，初秋傍晚，叫“卖野菱”的调儿，都抑扬有致，十分动听。卖线粉馄饨的，卖潮糕的，卖桂花糖芋奶的，卖糖粥的，笃笃地敲着竹板。捏面人的，吹泡糖人的，卖兰花豆油豆瓣的，卖山东大包的，卖小磨麻油的，卖糖炒栗子的，虽不曼声叫卖，但经过十

子街，经过我家门口，总有一定的时间，而且非常准时，有时竟可代时钟。我常听到佣人说：“今天时间还早，卖麻油的还没有来呢。”或者说：“快4点了，可以去买兰花豆了。”家家户户只要牢牢掌握这些小贩经过本街的时刻，包管能买到想买的东西。而最最富有诗意的，却是一深黄昏，油灯如豆，街上传来“香又香，糯又糯，香炒热白果”的叫卖声，惜乎我那时是幼孩，今天也远不是诗人，描绘不出当时的情景。

每天下午4点钟左右，女佣就带领我们（我和我的弟弟）到门口去玩。她一只眼睛照看我们，一边同左邻右舍聊天，我们则想等小商贩经过时，买点什么吃吃。这种时候，我们和女佣也会发生矛盾。说实话，我们孩子买点零碎吃，带领我们的人至少要吃一半，所以在买什么的问题上，她也要发言，由于爱好不同，常常争执。例如女佣总爱吃油豆瓣兰花豆，我和弟弟都要买捏面人和吹泡糖人，而这些小贩，偏偏在差不多的时候过我家门口，于是争执范围就扩大了：卖油豆瓣的自然站在女佣一边，捏面的和吹糖的则对女佣狠狠地瞪眼。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转糖”。转糖摊子上有个圆盘，上面划成许多格，多数是“空门”，但有几格转到时可以得彩。彩是糖小人，糖阿富，糖鱼。平心说，糖的质地很纯，没有什么添加剂，味道也不坏。一个铜子转两次，自然转到空门的次数多。孩子做这类事情，目的并不在于利得，所以，中固欣然，不中也不懊恼。但父亲总不让我转糖，说这是一种赌博，若爱吃这种糖，他宁可出钱买。我自然不违背他，但总觉得买来的糖远不如转来的糖好吃，不知是不是赌博心理在作祟。

吕思勉故居

我家就住在十子街中段，稍稍偏东，坐北朝南，分为东西两宅，各有大门进出。两门中间，还有三间房子，两扇小门，外通十子街，内有一条长街，通东西两宅的厨房。大约因为房屋进深，人来人往，若都从大门出入，开门关门比较不便，所以小门是整天开着的。甚至为了要保

持小门敞开，我家将三间小屋租给别人家住，名为租，实际上并不收钱，或者象征性地收几个钱，条件是给我家守门，让我们通行。

抗日战争前有很长一段时间，其父母曾将三间屋子借给我家老厨子顾金海夫妇居住。我家东宅在我祖父手里就典给别人了。所谓典，是借房客一笔钱，以每月房租抵充利息。每次更换房客，修理房屋的费用，因为父亲拿不出钱，就都加在典费上，所以典费愈来愈大。我刚懂事的时候，典价是两千多元，到抗战初年收回时，已近四千元了。因为典价大，房客难找，在装修房屋一事上，我父母极力迁就房客，这样，装修费用就更大。所以每到房客更动的时间，我父母都愁眉不展。这种滋味，我们小孩子是不懂的。东宅有房客住居的时候，我们当然不能随便进去，但旧房客已去，新房客尚未入屋的时候，就无异提供我们一个玩耍的新天地了。加以新天地中又有新事物：木工、泥水工、板条、砖瓦……工人忙忙碌碌，材料东堆西放，我们就在这些工人、材料中间，穿来穿去，跳进跳出，但一个时期之后，修理完毕，房客入屋，东宅又成禁区了。

西宅面积比东宅略小，大门进去是个堂屋，在我们家乡，这类门堂若再大一点，往往租给成衣铺，目的当然不在租金，也是希望大门畅开，进出方便。我家因有小门出入，加以门堂屋小了点，所以没有出租，大门经常关着，从门堂屋再进去是一个小园。门堂屋与小园之间有六扇屏门，平日只开一扇。园里东边有一件柴房，一口井，一株金桂，一丛淡竹，西面有株西河柳。西河柳可作药用，种西河柳的人家又不多，所以经常有人来讨。因为是药材，我们也不能不给，一株树经常攀折，总只剩下半株，垂头丧气地站在那儿。

又园的北部，东边是棵香园树，从不结果。西面是一架十姊妹，春花繁叶茂。十姊妹和香圆之间是门，可通园北面的天井，这个天井我们都叫它天明堂，以别于我们卧室前面的天井我们叫它明堂。天明堂里西边是一棵千瓣石榴，东面是一架葡萄。每到初夏，绿荫沉沉，可惜引来许多壁虎。有一次，一只小猫突然死了。大家疑心它不懂事，误吃了小

壁虎，为了保护别的小猫起见，就把葡萄掘掉了。天明堂北面是三间厅，厅北面是三间翻轩，是老厨子金海的卧室。翻轩北面又有一口井，天井两边是侧厢，当时向东的侧厢是女佣的卧室，西面侧厢是储藏室，西侧厢北面是厨房。这个天井里没有花木，只在阶前种着各种颜色的凤仙花、薄荷和藿香。天井北面是走廊，走廊北面是四楼四底的上房。走廊西端与厨房联结，开饭上菜时，就可以不在露天地里经过了。

当时楼上四间，东面两间是庶伯祖母的卧室，西面两间是父亲的书房和藏书室。楼下从东面数起，第一间是堂叔婶的卧室，第二间是客堂和吃饭的地方，第三间是父母和我的卧室，第四间是从堂姑母和我弟弟的卧室。

我初中毕业之后，父母就把东厢房收拾出来给我做书房，女佣改住西厢房。东厢房面积不大，最多不过十四五平方米，但东向有六扇玻璃短窗，阳光充足；一门通走廊，一门通父母和我的卧室，一门通西边一间翻轩。翻轩朝北，夏天比较阴凉，所以每到夏天我就到翻轩里去读书。我写到读书两字，不免脸红，说实话，那时我一点不用功。翻轩无形中就成为了我的夏书房。但因为砖地阴湿，蚊虫比较多，我又怕有蛇，所以只在晨、午才去那儿，一到傍晚，就收拾收拾书包走了。

我姑母和弟弟的卧室窗前有一个小天井，天井里有个小花坛，种着秋海棠。但这个天井是死的，除了从窗口爬进去外，无法入内。为了使小天井起死回生，我的书房里又装了两扇玻璃门，直通天井，可是这天井实在太小了。有一次，两只老鹰在天井上空搏斗，四只翅膀伸展开来，天井里顿时昼晦。一会儿，斗败的一只就落到天井里来了，这对于我们姊弟真是天赐的宝贝，你们想想看，是只老鹰呢！又是送上门来的，怎能不捉住它？！但老鹰是鸷鸟，尽管斗败，还是目光炯炯，啄和爪又那么锋利，谁又敢在窗口爬出去，怎样捉住它呢？这时有人说，老鹰落在人家是不吉的征兆，最好把它放走，但我和弟弟抵死不肯，一定要捉，就去找金海帮忙。金海拿来两根又粗又长的竹竿，从窗口伸出去，想把老鹰按在地上，然后翻窗去逮住它。不想老鹰一见有竹竿伸进去，立刻

抖抖羽毛，奋起两翅，冲天飞走了。我和弟弟惋惜不已，一连几天，讲着老鹰。

西宅的最北面，在外墙与楼房中间，有一条露天的夹弄，因为狭窄，不能说是天井，估计是为了通风，所以留此空隙。由于在最北面，加以日照少，所以很阴凉。每到夏天庶伯祖母常坐在扶梯下边狭窄弄口乘凉，身上只穿一件蓝夏布背心，手摇大芭蕉扇，她说那个地方是老人堂，是她的天地。

我现在絮絮地讲着西宅的种种，仿佛在说梦。抗战后期我们回到家乡，西宅只剩下一口井和半株河柳了。

最后，我还要补充几句和西宅有关的事，就是那儿多蛇也多蜈蚣。房子旧，空屋多，园里天井里杂草丛生，但有时限于人力，有时也为了保留一点天趣，并不马上清除，这就给它们提供了庇护所。才过清明，墙根屋角，就有蜈蚣出现。到了夏天，更不用说，晚上躺在竹床上纳凉，忽然手臂上给什么了螫一下，一看，竹床边上一条蜈蚣，急忙坐起来穿鞋子，鞋子又有一条。有天晚上，我们都在天井里纳凉，大家谈笑得正高兴，女佣顾兰珍忽然大叫起来，原来蜈蚣爬到她裤管里去了，等走到房里把裤子脱下，腿上已被螫了七八处。

还有一次，我给蜈蚣螫了，那时我还小，只有两岁多一点，啼哭个不停。有个佣人献策，说只要用鸡涎涂在伤口上，就能止痛，母亲没有别的办法，也就姑妄听之。可是我家不养鸡，只好到邻家去借一只公鸡，拎着鸡脚倒挂着，希望它流出口涎，鸡只是咯咯地叫，一滴口涎也没有，无可奈何只得把它再送回邻家鸡巢。以后怎样，我现在已记不起来，总之是闹得大家凉意全无，浑身是汗。

我生平看到的最大一条蜈蚣，也是在我家里。这是一个夏天的午后，大家才吃完西瓜，我突然看到凳脚旁边爬出一条蜈蚣，足有六寸，全身蓝黑有光，头（事实上不是它的头）是红褐色，我正想脱下鞋子来打它，不想一转眼就看不见了。以后好几天，我都十分警惕。

至于蛇，自然比蜈蚣更可怕。记得母亲告诉过我，多年前她有一天

到储藏室去，看见一条蛇盘在米囤上，我母亲吓得返身就走，其时有人对她说盘在米囤上的蛇是仓龙，是发家征兆，不可惊动，叫母亲焚香祝告。过些时候再去看，蛇自然走了。蛇肯定不是焚香祝告才走的，像藏米的屋子那样干燥的所在，蛇都会光顾，我家蛇之多，也就不难想见了。

我六七岁的时候，一天上午，金海来对母亲说，他在井边淘米的时候，看到一条四脚蛇，来吃淘米水。女佣也说在井边洗衣时看到过蛇，母亲就叫金海去找人捉蛇。当时我们家乡有种以捕蛇为专业的人，传说手段最好的是个驼子。他原来并不驼背，一次为人捕蛇，蛇钻进阴沟，他撬开阴沟的盖，也追踪进去，于是在阴沟里就展开了人蛇的搏斗，蛇盘在他身上一昼夜，他终于把蛇杀死，但自己也成了驼子。这自然是传说，但这类人中，确有技术高强的。

三四天之后，金海带着两个中年人进来见我母亲，说他们会捕蛇。母亲请他们先查看园子。他们在园里走了一圈之后，又走遍西宅，然后对母亲说，宅子里的确有野蛇，如果要他们捕捉的话，每一条价一元二角，蛇也要给他们。母亲亟于要把蛇捉去，就依他们提出的条件。于是两人先在园里墙根屋角找寻蛇洞，然后做出蛇叫的声音。接着在食指上涂了药，蹲下身子，把食指伸进蛇洞去。这时我们全家，那天我父亲也在家里，都在园里看捉蛇，团团围在他身边。他回头来对我们说：“蛇马上要咬我了。”话才说完，他突然厉声说：“好，来！”猛地站起身来，一条蛇咬住他手指，给他拖了出来。他把蛇放在篓子里，然后把手伸给大家看，整只手和小臂都肿了。他取出一种药，涂在臂上手上，药到那里，那里肿就消了。我姑母问他，蛇咬他的时候，痛得厉害吗？他说并不痛，只是心脏猛烈地颤动一下。这一天，一共捉到八条蛇，其中两条是四脚蛇，别的蛇或园里捉到的，或是长弄堂里捉来的。他们一下子拿到九元六毛钱，蛇还在外。他们还拿出一种像墨腊一样的黑药给我们瞧，这是祖传秘方，不论蛇伤还是蜈蚣黄蜂螫伤，都可医治。他用黑药在地上画一个直径两尺以上的大圈，把刚才捉来的蛇放一条在圈子中央，那蛇沿着圈子来回游着，却不能越出圈子。母亲另出六毛钱，买了

块黑药。这药战前一直珍藏着，战后房屋被毁，当然不知去向了。

捕蛇的人为了使孩子高兴，还做了精彩表演。第一种是夹黄蜂。他们看到黄蜂或大苍蝇飞进窗来，就用一双竹筷望空去夹，竟是百发百中。第二种是撕蛇，两手捏着蛇的上下颚，只一撕，一条蛇就劈成两片，肚里一颗颗白的什么东西，连着血一同流出来。母亲听说撕蛇，早已回身进去，可是父亲和我们孩子都要看，虽然我们也只看他撕一条蛇，但这天谁也没有能吃午饭。

第二天一早我就对父亲讲，我要学捉蛇，要拜那两个捕蛇人做师傅，我要知道怎么制蛇药，给人家捉蛇医伤。父亲见我很认真，也认真地对我说：“孩子，这是一种危险的行业，我不能让你去学。”

“为什么危险呢？”我问。

“你不看见他把手指伸进蛇洞去让蛇咬吗？”

“不是有黑药吗？”

父亲把我拉到身边，摸摸我的头说：“不错，有黑药。”他稍稍顿了顿接着说：“但蛇毒不是一样的，那黑药也许只能治一种蛇毒，要是遇见别种蛇毒，黑药治不好，那就危险了。”

我想了一会儿说：“那么那捉蛇的人也会被蛇咬死的，如果他被咬死，黑药不是要绝种吗？”我当时还不说“失传”两字。

我父亲也想了想，显然，他是想怎样向我解释，我才能明白。后来他说：“本地有那几种毒蛇，捉蛇的人心里是有数目的。但远处的毒蛇，就和这里的不一样了。只要他们不到远处去捉别种毒蛇，他们就没有危险。”

我当时是不是能理解父亲的话，现在很难说，但听到捉蛇人不会被毒蛇咬死，黑药也不会绝种，也就放心了，便没有再嚷着要学捉蛇。写到这里，我想起前几天（1986年7月30日或31日）《文汇报》第四版报道虹口区一个做蛇买卖的人，将蛇放在蛇皮袋和酒瓮内，夜间逸出四十几条。数日之后，一位邻居清晨起床，发觉门框上和台上分别躺着三条一米长的蛇。又说这场蛇害已殃及附近居民，有的居民只能掩门闭窗

人寝。这使我记起六十余年前的往事，心里想要是我当初真的学会捉蛇，说不定今天会去一显身手，为居民除害呢。

我家中的蛇经此大捉以后，园里的确不再出现了，但旁的地方并没有完全绝迹。好几年之后，那时东厢房已成为我的书房。有一天母亲站在姑母卧室的窗口，只见我书房的长玻璃门上，有一条大蛇，足有三尺长，手腕粗，母亲失声惊叫，蛇一听见叫声，立刻回过头来，向母亲张口吐舌，样子十分可怕。母亲立刻找来捉蛇的人，当然不是上次来的，捉蛇人在宅里巡视一会，说是家蛇，不肯捉，就走了。

蛇有家野之分，捕蛇人又不肯捉家蛇，究竟是何理由，我现在还不明白。

我的家庭

在谈我的家庭之前，先要讲一下余之三叔一房和我们一房的关系。余之三叔和我父亲同出高祖翼士公之后，从世系的关系上看，已经是五服的边缘，该说是很疏了。余之叔父的父亲朗山公在江西做官，死在任上，身后一无所有，却留下董夫人、侧室包夫人和一子四女七口，我祖父就迎接他们到常州来住在一起。当时我祖父的负担本来已经不轻，除妻子儿女外，还要负担他的继母华夫人和他的两个姊姊，即是我的继曾祖母和我的祖姑母的生活。

我祖父只做过几年（1892—1897）江浦县的县学教谕，以后就以坐馆为生。据说当时修敬每月只有二十元，要维持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自然极其为难。父亲小时候本来是请了先生来家教读的，可是十二岁以后，家里就请不起先生，由我祖父母和我的姑母教他了。然而仅仅节流还是敷衍不过去，我祖父就将两所市房卖掉一所。卖掉的市房坐落在哪里，我当然不清楚，就是我父亲也未必很清楚的，但另一所市房，我还记得有点影踪，是在常州南大街，可是在我有点懂事的时候已经不能说是一所，恐怕只能是几间。由于街道放宽，服务面积就相应缩小，

仿佛还经过一次火灾，到抗日战争时候，就完全烧光了。

余之叔父是肖狗的，比我父亲小两岁，小时候和父亲一块读书。四个从堂姑母，大姑名馨，嫁于同邑史家，二姑名端，嫁与同邑林家，都是伯祖母董夫人生的，三姑名勤，肖鼠，嫁与同邑管雪忱先生。当时，雪忱先生在武汉艺专里教图画，他是余之夫人即我的婶母的从堂兄弟。我婶母名馥如，肖羊。四姑字瑞之，肖龙。三姑四姑和余之三叔都是庶伯祖母包夫人所生。大姑后来是我的寄母，我的小名荣，也是她取的，据说我五行缺火，她就给我取了个荣字。二姑三姑很早就去世，我所以记得三姑肖鼠，因为我小时候庶伯祖母跟我开玩笑，指着三姑说，她肖老鼠，叫她老鼠叔叔。我家传统，侄儿侄女都称姑母为伯叔，称伯叔为寄爹，孩子懂得什么呢？我就一直称她老鼠叔叔，直到她去世。

四姑瑞之是旧历壬辰（即1892年）生的，比父亲小八岁，她到学龄的时候，我家已经请不起先生，由我的祖母亲自教她读书了，所以她也通文墨。她嫁与常州盛绶臣，婚后夫妇不睦，一直住在家里，后来我弟弟出世，就由她抚育，所以我们和她感情特别好。

话再说回来，祖父负担我从堂叔父一房的确不容易，单看上边所说就能理解了。一帮子学龄儿童，个个要读书受教育，而且我家传统是男孩子们同样受教育的；接下去男婚女嫁，还有两个老人，生养死葬。我祖父是个极其宽厚而又极其端方的人，1904年我父母结婚，1905年他就病了，病了一年，1906年去世。这就是说，我母亲婚后才一年多，祖父就去世了，然而母亲谈到祖父，总十分感动。她常常讲起两件事：一是祖父病时不肯服药，祖母常叫母亲端着药去给他喝，祖父为了对新媳妇的礼貌，总是勉强喝了。另外一件事是祖父病危时，曾关照我祖母，说虞家小姐（指我母亲）很忠厚，要照顾她。母亲讲到后面一件事的时候，有时还流泪。

现在谈我的祖母。祖母当年作为家庭主妇是极不容易的，家里人口多，经济条件差，上面还有婆婆，即我的继曾祖母华夫人。继曾祖母是老实人，不善应变，家中开支，等等，都墨守陈规，亲戚来借贷的，也

不问真伪，有求必应，这种借贷，自然是有去无回的了。这就增加了家庭的困难。旁人了解情况的，总劝祖母要撙节开支，祖母怕婆婆不高兴，却总是顺着她。这局面，直到曾祖母去世后逐渐扭转。

祖母有过人的才智。她生在太平天国时代，兵荒马乱，连《孟子》也没有读完，可到后来，能诗能文，也通晓经史，尤其难能的，是她督教子女极其严格。祖父母只有我姑母颂宜和我父亲一儿一女，姑母又长我父亲九岁，祖母爱我父亲自不用说了，瑞之姑母告诉我，父亲结婚之后，祖母还总称他“宝宝”。可是我父亲交待功课时，若有半点含糊，书就从他头上飞过去了。父亲非常欢喜下棋，象棋围棋都下得不差，他说十二岁时看到我祖父跟人下围棋，心里就很喜欢，但那时我祖母教他读书，估计决不会允许他下棋。瑞之姑母还告诉我，祖母的外号叫老虎，她的甥儿有时叫她老虎舅舅，我姑母颂宜干脆不叫她母亲而叫她老虎，大约也是小时候叫着玩，习惯以后就改不了口，正像我叫三姑母老鼠叔叔一样。

父亲六岁时从薛念辛先生读书，姑母也从过薛先生。姑母非常聪慧，而且性格开朗，弟妹都极喜欢她。她出嫁之后，还天天盼望她回娘家，都说大姊姊一到，仿佛吹来了一阵春风，尤其是父亲，只要有一点小病，就嚷着要姊姊，祖母只得派人去接她回来。

姑丈丁蒲臣（讳守铭）是祖父的学生，和父亲一同从祖父读《尔雅》。当时读书要背，可是我父亲却不愿意背《尔雅》。他看到祖父读书极其专心，而且一段书没有看完的时候，决不放下书来做旁的事，就钻这个空子。每到祖父聚精会神看书的时候，父亲就把《尔雅》塞过去，说要背书，接着就背起来。等祖父看完一段书，开始听父亲背书，父亲已背到最后几句了。但我姑丈背《尔雅》十分认真，祖父赏识他，就把姑母许配他了。姑丈是驼子，文学上的造诣也不如我姑母，姑母遗下的几首词中，有一首就是代姑丈捉刀的。我小时候听到这些事，很代姑母叫屈，认为她做了《尔雅》的牺牲品。其实他们夫妻感情一直很好，最近我在父亲遗稿内，看到姑丈的词作，也很不错，才觉得自己的看法是很幼稚

的。

我父母结婚时（光绪三十年甲辰，公元1904年），姑母已经去世了。她去世亦在甲辰，不过在我父母成婚以前。嫁给史家的大姑是否已经出嫁，我一时查考不出。但母亲做新娘时，家里至少还有三个小姑。祖母不独督责子女读书严，家里规矩也很多。母亲说，那时如果祖母不叫她坐，她这个做媳妇的，就只能侍立。我舅家家规也很严，但严的只有我外祖父，我外祖母却是开朗随和的人。加以做媳妇和做女儿不同，祖母尽管严，姑母却敢叫她老虎，而且“老虎”也答应她，从此这个称呼就公开地确定下来。母亲尽管心里叫她老虎，哪能出口呢？所以母亲刚结婚时，也很不习惯夫家的生活。母亲最怕二姑，因为二姑每天给祖母梳头，一边梳头，一边就讲新娘子怎么样怎么样。她并不一定讲母亲的坏话，目的也不一定是“进谗”，只是手里有事，嘴巴闲着，讲讲罢了，但多言极易失口，甚至说好话，有时都会起反作用，何况姑媳间的鸿沟，已不是一家一户一代的事，而是家庭制度的副产品呢？三姑还小，而且性格开朗，成天嘻嘻哈哈。只有四姑，当时才十二岁，因为新房里好玩，成天钻在母亲房里。十二岁，还是个孩子，母亲那时二十岁，也还是青年，这样，一个孩子，一个青年，就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母亲一生辛劳，四姑母成了她很好的帮手，四姑母一生多苦多难，母亲是她有力的支柱。

母亲姓虞名菱，字缝兰。外曾祖父讳映溪，做过浙江衢州府知府，

外祖父家

母亲姓虞名菱，字缝兰。外曾祖父讳映溪，做过浙江衢州府知府，外祖父笏荃公讳树荪，是前清贡生。母亲有一姊一弟，姊适同邑巢兆觉先生，生下一个女儿（巢心北）后，没有几个月就去世了。我的舅父讳祖同，号勤谷，上海大同大学毕业生，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英文编辑，舅母同邑华瑞英女士。我没有见到姨母，她在我出生之前七年就去世了，外祖母在我出生后去世，可是那么爱我的外祖母，我竟会没有一点印象。舅舅我还记得，他因为读书工作都在上海，难得回来，有时来看